



李东阳 与茶陵派研究

薛 泉◎著

6=48

 人民出版社

K825.6=48
20143

阅 览

李东阳 与茶陵派研究

薛 泉◎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东阳与茶陵派研究 / 薛泉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01-012988-4

I. ①李… II. ①薛… III. ①李东阳(1447~1516)—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4786 号

李东阳与茶陵派研究

LI DONGYANG YU CHALINGPAI YANJIU

薛泉 著

策划编辑: 刘智宏

责任编辑: 刘智宏 苏向平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人民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门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6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65289539

印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版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235 千字

书号: ISBN 978-7-01-012988-4

定价: 32.80 元

著作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印制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250042

序

李东阳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李东阳评传》的后记中，我曾就李东阳其人以及对他的研究说过这样一段话：

“身为内阁首辅，他既有与权奸斗争、独立支撑危难时局而为人称赏的一面，也有因未能及早退位、依违处事而为人诟病的一面；作为文坛领袖，他独力开创了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茶陵诗派，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但也因其置身文学史的过渡时期，在诗文理论和创作特色上不像稍后的前后七子那么极端，而程度不同地受到治文学史者的忽略。这样一位在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走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有着怎样的处世态度和心路历程？他与他所开创的茶陵诗派与湖南茶陵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这一诗派的理论和创作具有什么特点？在文学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对李东阳这样一位早年以神童著称、后期以儒雅名世、兼擅文史书法而又颇具政治才干的历史文化名人，究竟该如何评价？能否穿过时空的烟云，揭开表层的障蔽，尽量客观真实地加以认识和反映？这些问题，无疑需要后人认真地思考，需要治文化史者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然而，从李东阳逝世的正德十一年（1516）算起，至今已有489年了，其间论述其人其事者虽然不少，但总括其一生行迹予以详细评传的专书，尚未见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大概正是出于此种原因，我与薛泉博士于两年前合作撰写了《李东阳评传》一书，希望稍稍填补一下这一空白。但现在看来，限于该书的体例和自身的学力，这部评传在深度上还是有欠缺的，特别是在涉及李东阳政治心态、诗文创作和理论等方面，也都有继续开掘的空间。换言之，要展示这位政治家、文学家深

微隐曲的心性和独具特点的理论创造,还需要别出手眼,从学术层面予以更深入、更科学的考察。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紧张的撰写之后,就有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由薛泉博士完成的《李东阳研究论稿》。

作者本着不求体系完整、力求解决问题的原则,以当前研究之薄弱环节或研究空白为切入点,选取了政治心态、文学思想、文人交游和诗文传播与接受等几个维度,对李东阳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总观全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其一,以“吏隐”概括李东阳的政治心态,认为“吏隐”是李东阳调和山林情结与仕宦生活的中和之举,是忧患意识、仕宦意识、隐逸情怀整合的产物,“吏隐”在很大程度上凝铸了李东阳的人格及文化品格。其二,比较系统地探析了李东阳的文学思想,并将之细化为文体辨析、复古通变、中和言情三个层面,发掘其内在逻辑联系,指出文体辨析是其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石,复古通变说是发展动力,中和言情说是核心要素。其三,通过李东阳与前七子接受与反接受的分析,揭示出明中叶审美思潮及主流文学转型的某些特点与规律。其四,对李东阳诗文在明清两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予以大致梳理,归纳出一个先热后冷、最后又有起色的传播接受过程,而在其致导因素方面,则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时代审美风尚、推崇表彰乡贤、图书文化事业发达等多种社会文化因素的交互影响挂起钩来,由此获得一个较为合理也较为新颖的解释。以上诸方面内容,多是建构在详实的材料基础之上,不作蹈空之语,且论述得法,不乏新意。这对深化李东阳研究乃至整个明代文学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价值。

薛泉君曾师从国内著名学者刘崇德、詹福瑞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后于2004年7月进入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跟我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其间,参与了我所主持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与湖南茶陵县委合作的“李东阳与茶陵诗派研究”课题。这一研究工作先从撰写《李东阳评传》开始,由我拟出全书纲要,薛泉负责材料收集和撰写工作。在研读了李东阳诗文及与之相关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历时一年完成初稿。随后,我对初稿作出较大幅度的修改,于2006年1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基础上,薛泉继续深入挖掘,以《李东阳研究论稿》为题,撰写博士后出站报告,获得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并在武汉大学获得副教授职称。嗣后,薛泉君利用在天津大学工作的间隙,抓紧修订和补充,终于完成了这部近二十万字的书稿。

薛泉君祖籍山东,讷于言而敏于行,性格忠厚稳健而不乏灵性。后转徙天

津、武汉求学,于宋明两代文学均有广泛涉猎,其专业基础和理论素养均较为厚实,学术视野亦相对开阔。我想,倘循此以往,努力精进,则于学问之道必能不断深入,层楼更上。薛泉书成,索序于我,聊弁数语,而深寄望焉。

尚永亮

匆草于珞珈山麓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一、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1
二、研究范围与主要内容	/ 4
第一章 李东阳的政治心态与文化品格	6
第一节 仕宦意识:政治理想的追求与失落	/ 6
一、仕宦意识的形成与高涨	/ 6
二、仕宦意识的淡化与终结	/ 13
第二节 忧患意识:国计民生的关注与思考	/ 21
一、忧患意识之流程	/ 22
二、忧患意识之特征	/ 29
第三节 “吏隐”:心灵矛盾的超越与文化品格的熔铸	/ 33
一、“吏隐”之纵览——先秦至明中叶	/ 33
二、“吏隐”:矛盾与痛苦的超越途径	/ 38
三、“吏隐”与人格及文化品格的熔铸	/ 44
第二章 李东阳文学思想探微	50
第一节 文体辨析说:文学思想的理论基石	/ 50
一、体类之辨	/ 51

二、体派之辨	/ 59
第二节 复古通变说:文学思想的发展动力	/ 65
一、兼师众人之长,自铸一己风格	/ 65
二、以复古为通变,探索文体革新	/ 69
第三节 中和言情说: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	/ 73
一、重视诗乐之美,恢复言情本质	/ 73
二、注重民歌时调,抒写真情实感	/ 76
第三章 李东阳与茶陵派成员交游	82
第一节 茶陵派的形成	/ 82
一、茶陵派名称之由来及其他	/ 82
二、茶陵派的成立	/ 85
三、茶陵派形成上限考	/ 91
第二节 李东阳与茶陵派成员交游概述	/ 94
第三节 李东阳与茶陵派成员交游举例	/ 99
一、与谢铎交游	/ 99
二、与邵宝交游	/ 104
三、与彭民望、杨一清交游	/ 108
第四章 李东阳与前七子之关系	116
第一节 双向接受及其文化意蕴	/ 116
一、与前七子双向接受述考	/ 116
二、双向接受之因及其文化意蕴	/ 121
第二节 反接受发展轨迹述考	/ 124
一、摩擦期:弘治末年至正德初年	/ 125
二、对立期:正德初至正德十一年	/ 127
第三节 反接受的原因及其文化意蕴	/ 131
一、文学观点相左及人格差异合乎逻辑的发展	/ 131
二、明人矫激意识与时代主流学术转向的影响	/ 136

第五章 李东阳诗文作品的传播与接受	143
第一节 李东阳自觉谨慎的文学传播意识	/ 143
一、注意传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 144
二、重视作品的传播与接受效果	/ 146
第二节 李东阳诗文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	/ 150
一、单篇传播状况	/ 150
二、结集传播概观	/ 152
第三节 《怀麓堂稿》与《怀麓堂续稿》在明清时的传播与接受	/ 160
一、《怀麓堂稿》、《怀麓堂续稿》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	/ 160
二、《怀麓堂稿》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	/ 164
附录:李东阳研究资料选编	168
主要参考文献	207
后 记	227

绪 论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又号警斋,湖广茶陵(今湖南省茶陵县)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作为政治家,他一度官至内阁首辅,是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自明中叶以来为人毁誉不一。作为文学家,其一生著述宏富,有《怀麓堂稿》、《怀麓堂续稿》等诗文集传世。他所开创的茶陵派,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明清以降,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李东阳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与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尚不相称。因此,仍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一、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以来的李东阳研究,在生平事迹、著述版本、茶陵派成员的界定、诗文研究、文学理论、与前七子关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邓绍秋、司马周已撰文有较全面的回顾^①,故本书不再详述,主要就研究疏漏之处及存在的问题略作补充。

(一)生平事迹。在对李东阳的评价上,存在一种充分肯定的观点。如张守龙《试论李东阳》^②一文以为:李东阳独留内阁,忍受屈辱是讲究斗争策略,只有如此,“才能最后达到保全善类的目的,事实也恰恰如此”。刘明浩、赵中男、贾

① 邓绍秋:《明代李东阳茶陵诗派研究百年回顾》,《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3期,第60~63页。司马周:《20世纪茶陵派研究回顾》,《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94~98页。

② 《松辽学刊》1987年第3期,第79~84页。

艳敏、冯宪军、蓝东兴等人也大致持此观点。^①进入21世纪,甚至有人要为李东阳全面翻案,如颜秋桦《明朝李东阳暗斗阉党》^②一文即有此意。可以说,对李东阳政治心态缺乏全面透视,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茶陵派成员界定。关于茶陵派成员问题,明清时即有人谈及,但多没能明确厘定。周寅宾《明代的茶陵诗派》^③一文,较早对茶陵派成员予以界定。该文认为,茶陵派成员主要有两部分:李东阳的同年进士、翰林院的同官,如谢铎、张泰、陆钱等;李东阳的门生,主要有邵宝、石瑄、罗玘、顾清、鲁铎、何孟春、储巏、陆深、钱福、乔宇、张邦奇、杨慎等人。廖可斌《茶陵派与复古派》^④一文持论亦同。司马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茶陵派成员进行了详细划分,认为茶陵派成员由三部分人构成:一是茶陵派宗主,二是茶陵挚友,三是西涯众门生。^⑤其中,第二点主要以李东阳交游为观照中心,从审美情趣、艺术风格、诗文理论等方面来区分唱和友与唱和者。唱和友属茶陵派成员无疑,唱和者却不被视为流派成员。统观之,上述界定标准略显粗疏,是否合理,也值得商榷。如李东阳门生众多,并非皆为茶陵派成员,以何为标准来划定,原本就是个复杂的问题。因此,探索更科学、更合理的界定标准,仍是李东阳及茶陵派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诗文研究。李东阳诗文研究虽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在广度、深度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从总体上说,李东阳诗歌研究泛化多于具体,且有些领域尚未涉足。如《北上录》、《东祀录》等杂记中的诗歌,尚少有人进行专门、细致的研究,散文方面研究更少。散文占李东阳作品相当大的一部分,记录了其生平思想、文学创作以及交游等情况,但研究者却少有涉及。如几种常见的文学史,言之甚少,且评价较低,研究论文更不多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情况有

① 刘明浩:《试论明代文学家李东阳》,《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第277~283页。赵中男:《刘瑾乱政时期的李东阳》,《史学集刊》1989年第4期,第26~30页。贾艳敏:《大学士李东阳简论》,《黄淮学刊》(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第92~95页。冯宪军:《明代著名政治家李东阳》,《文史知识》1995年第12期,第79~84页。蓝东兴:《明武宗时期的李东阳》,《贵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70~74页。

② 《炎黄春秋》2004年第3期,第74~77页。

③ 《学林漫录》十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0页。

④ 《求索》1991年第2期,第85~90页。

⑤ 司马周:《茶陵派与明中期文坛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1页。

所改观。如周寅宾的《李东阳的散文与明代前期的文化思潮》^①一文,从与明代科举、宋明理学、唐宋散文关系三方面,探析李东阳散文与明代前期文化思潮的关系,角度新颖。顾易生、孙克强的《试谈李东阳的辞赋》^②,则对《李东阳集》的18篇辞赋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予以高度评价。作者认为,李东阳有些辞赋“往往通过缅怀、歌颂历史和当代人物,抒发自己的报国宏愿和关心民众的热情。这是屈赋精神的继续,而为历代赋篇中所比较罕见的”。虽有褒之过当嫌疑,却开风气之先。可惜,至今此类研究仍属凤毛麟角。另外,李东阳的散文中,墓表志铭所占数量不少,也少有人问津。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李东阳研究的深入。

(四)文学理论。李东阳文学理论一直是李东阳与茶陵派研究的重点。关于李东阳文学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多集中在与台阁末流关系研究上。如朱维之指出,李东阳主张“格调”说,是为矫正台阁体末流之弊。宋佩韦亦如是说。80年代以后,不少论者一直持论如是。如阮国华的《李东阳融合台阁与山林的文学思想》^③一文指出:“为了纠正台阁体末流的肤阔与虚泛,他(东阳)希望借助于最便于士人真实地挥洒情志、最易于获得审美价值的山林文学来予以补救。”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李东阳研究的深入。实际上,李东阳文学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远不止于此,如陈献章等人的学术思想、明代主流学术转型等,也应是值得观照的因素。再者,李东阳复古文学理论的内涵、本质,亦需系统、细致地分析与阐释。

(五)与前七子之关系。宋佩韦、刘大杰、郭绍虞、朱东润等前辈学人皆言及此问题,惜未详论。受其启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除达成共识的李东阳有兴起前七子之功外,还涉及前七子对李东阳的批评等方面。周寅宾的《明代的茶陵诗派》认为,前七子既受李东阳启发,又对其文学主张有不满的一面。陈书录在《明代前七子“宗汉崇唐”心态膨胀的诱因》^④一文中说,李梦阳等对李东阳的态度有一个从“师法”到“独讥其萎弱”的转变过程。前七子鉴于李东阳“提倡‘浑雅正大’而被所谓‘正大’的儒家思想所拘牵,因而

① 《中国文学研究》1987年第4期,第26~33页。

② 《文史哲》1990年第5期,第80~84页。

③ 《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第90~97页。

④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8~12页。

在复雅脱俗之中往往绕开所谓‘正大’的儒家思想而偏向于文学形式上的雅丽之美,以便于将自己与前者区别开来”。总体上看,李东阳与前七子关系的研究还显得有些肤浅、表面化。就二者文学观而言,多从诗歌方面立论,而忽视散文,其原因分析,亦有待于深化、拓展。况且,二者关系并非仅限于文学观点。

另外,李东阳诗文在明清时的传播与接受,至今还是研究的空白点,也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李东阳研究,在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有些领域研究尚不够精深,甚至留有一些空白点,仍有拓展的空间,有继续研究的必要。

二、研究范围与主要内容

李东阳研究虽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但笔者暂无实力一一进行深究,故仅开列数题,暂辟五章,不求体系完整,力求解决问题,余俟来日另撰文申论。^①

(一)政治心态与文化品格。本书从仕宦意识、忧患意识、吏隐矛盾等几个相互关联的层面,挖掘李东阳独特、复杂的政治心态。李东阳的仕宦意识经历了一个由高涨到低落直至消解的动态发展历程。忧患意识与仕宦意识有统合的一面,但又不随仕宦意识的终结而泯灭,有其丰富的内涵与鲜明的特性。“吏隐”是李东阳调和山林情结与仕宦生活的中和举措,是忧患意识、仕宦意识、隐逸情怀整合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吏隐”铸就了李东阳的人格与文化品格。李东阳具有忧国忧民意识,有正义感和责任感,又在一定程度上迷恋权位,性格懦弱,缺乏抗争意识。过高褒扬或过低贬抑,皆不符合客观实际。

(二)文学思想。李东阳文学思想内涵丰富,是其回复诗歌审美艺术的结晶。文体辨析、复古通变、中和言情是其文学思想的三大亮点。文体辨析、复古通变最终皆集中指向了中和言情。文体辨析是为强调文体本色,以便更好地言情;复古通变也以言情为中心。可以说,文体辨析是其诗文的理论基石,复古通变是发展动力,中和言情是核心要素。李东阳文学思想于台阁体既有因袭因子,又有否定成分,是新旧内容的混合体,颇有兴起前七子之功,对明清诗文创作与文学理论的走向影响深远,尽管尚存缺陷与不足。

^① 关于李东阳诗文研究,笔者拟另设专题《李东阳诗文研究》详加探讨,本书暂不列此专题。

(三)与茶陵派成员交游。本书反驳了茶陵派形成上限的两种观点,将其考定于成化九年(1473)左右,勾勒出李东阳与茶陵派成员交游的基本情状。重点探讨李东阳与谢铎、邵宝、彭民望、杨一清等人的交游。李东阳与茶陵派成员的交游,并非仅限于游山玩水、诗酒风流,关注国计民生也是交游涉及的重要内容。李东阳与茶陵派交游,巩固了流派成员间的关系,加强了文学传播与交流,浸淫了当时的文气。交游所表现出的某些共性,对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有重要意义。

(四)与前七子之关系。本书从双向接受与反接受两个层面对李东阳与前七子的关系进行探讨。李东阳与前七子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双向接受到反接受的发展过程。本书着重分析了双向接受、反接受的原因及其文化意蕴。双向接受基于双方各自的需要及近似的文学主张,也是当时主流审美思潮与文学审美趣味的反映,暗示出主流学术及文学转型的时机尚未成熟。反接受是文学观点差异、偏激意识、人格冲突、主流学术转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中可窥见明中叶审美思潮及主流文学转向的某些特点与规律。

(五)诗文的传播与接受。首先,本书从注意传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重视传播与接受效果两个层面,阐述了李东阳自觉、谨慎的文学传播意识。其次,对李东阳文学作品的传播类型,即单篇传播与结集传播进行分类研究。本书认为二者各有其特点,在李东阳诗文传播与接受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后,选取《拟古乐府》、《怀麓堂稿》、《怀麓堂续稿》三个典型个案,梳理其在明清时的大致传播概况,归纳出其两头热、中间冷的传播接受态势,并从社会文化学的角度予以阐释。

第一章 李东阳的政治心态与文化品格

李东阳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其政治心态殊为复杂,而与之相关的人格、文化品格,自然也有些扑朔迷离。这一切都是评价李东阳不能回避的问题,至今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本章拟从仕宦意识、忧患意识、吏隐矛盾等几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入手,对李东阳的政治心态与文化品格进行较为系统的探析,以期揭示其深层的社会文化意蕴,对其予以合理定位。

第一节 仕宦意识:政治理想的追求与失落

仕宦,即做官。这里所谓的仕宦意识,特指行为主体对入仕为官、升迁的渴望度,对既得官位的在意度,以及为官如何作为等一系列问题的心理体验。李东阳的仕宦意识经历了一个由高涨到淡化,以至终结的动态发展历程,也是其政治理想由追求到失落的集中反映。在此过程中,其政治心态得到了多方位展示,体现出明中叶某些社会文化特征。

一、仕宦意识的形成与高涨

大致以弘治十四年(1501)为界,李东阳的仕宦意识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不

同的阶段。^①前一阶段为其仕宦意识的形成与高涨期,后一阶段是淡化与终结期。

时代文化背景与所受教育奠定了李东阳追求仕宦的人生基调。科举考试是明政府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也是文人士子入仕的最主要途径。明政府规定:“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②作为一项统治措施,科举制度有力地调节着人们的价值取向,明代士子趋之若鹜。庄昶的《送戴侍御提学陕西序》即云:“今之世,科举之学盛行,求者曰是,取者曰是,教者曰是,学者曰是,三尺童子皆知科第为荣,人爵为贵,一得第者辄曰登云,辄曰折桂,辄曰登天府,欢忻踊跃,鼓动一时,自童习以至白纷,率皆求之,殫竭心力,必获乃已。至于所谓义理,所谓性分,曾不知果何物也。”^③吴宽的《送周仲瞻应举诗序》亦云:“既以科第为重,则士不欲用世则已,如欲用世,虽有豪杰出群之才,不得不此之习。”^④可见,士人迷恋科举已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气候”。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曾说:

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少少排斥别的……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就是逼他改弦易辙。^⑤

此虽就艺术家创作而言,同样也适于士人人生道路的选择。李东阳生活于此种“精神气候”中,自难脱其影响。在父师的引领下,他少时即已养成追求仕宦的意识。他自幼以神童著称,父李淳对其亦寄予厚望,故悉心培养。七岁时,李东

① 据《求退录》,李东阳从弘治八年(1495)二月开始求退,弘治十四年(1501)开始大量上疏求退。《求退录·奏为自陈休致事》即云:“盖自弘治辛酉之后,数乞退休。”(李东阳:《李东阳集》三,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486页。)弘治辛酉,即弘治十四年(1501)。(按:以下引文、注释凡出自李东阳同一著述者,版本信息仅标首次。)

②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选举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95~1696页。

③ 庄昶:《定山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68~269页。

④ 吴宽:《匏翁家藏集》卷第三十九,《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法]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5页。

阳师从父挚展毓学习为文,八岁便“以童子奉诏入顺天府学为诸生”^①,师从陈俊学习举业。不久,又从湘籍状元黎淳学习举子业^②,其追求仕宦的人生奋斗目标愈加明朗化。他本人对此亦不讳言,《应天府乡试录序》即云:“自科举之法行,天下之愿仕者,挟经而抱艺,虽遐陬僻壤,衡鉴所在,皆起而趋之。”^③《送李士常序》亦云:“今之仕也异于古,皆取之乎科目,舍科目则不得仕,仕亦不显。故凡称有志于天下者,不得不由此焉出。”^④而且,他还占地利之便,其生活的顺天府“尤密近辇毂”,录取名额“独多于诸藩”,他深以“由斯地以出”而“自幸”。^⑤这种文化特权思想,进一步强化其仕宦意识:穷乡僻壤之人尚且趋之,“况教化所始,王畿之近地哉!”^⑥

如果说少年李东阳的仕宦意识主要表现为欲博取高第,那么入仕以后则着重聚集于如何追求仕宦之显达。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李东阳科举及第,又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当时的兴奋心情,从陆鉉“行过玉河三百骑,少年争说李东阳”^⑦的诗句略可感知。庶吉士多为新科进士之精英,明中期的庶吉士实为朝廷储备人才的生力军,故“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⑧,即已成为明政府权力中枢——内阁的候选人。这一方面强化了其固有的仕宦意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激发起他更高的仕宦追求。初入仕途的李东阳,渴望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其仕宦意识之高涨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深感皇恩,勤于官事。初入仕途,李东阳春风得意,对皇帝的“恩遇”甚为敏感,仕宦意识急剧升温。其《庆成宴有述》诗曰:

殿庭开宴引千官,拜舞亲承万岁欢。坐拥日华看渐近,犹传天语饮教

① 李东阳:《文稿》卷二十六《明故封承德郎户部主事陈先生墓志铭》,《李东阳集》二,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38页。

② 李东阳《黎文僖公集序》称:“东阳昔从文僖黎公先生游,举业之暇,获见所为古文歌诗诸作。”(李东阳:《文后稿》卷之四,《李东阳集》三,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977页。)

③ 李东阳:《文稿》卷之六,《李东阳集》二,第452页。

④ 李东阳:《文稿》卷之二,《李东阳集》二,第404页。

⑤ 李东阳:《文稿》卷之七《顺天府乡试录序》,《李东阳集》二,第466页。

⑥ 李东阳:《文稿》卷之六《应天府乡试录序》,《李东阳集》二,第452页。

⑦ 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⑧ 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选举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02页。